

20 世纪 50 年代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与 史学论争的互动关系

伍婷婷

(中国人民大学 历史系, 北京 100872)

〔摘要〕 重新梳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文献资料和史学研究成果可以发现: 20 世纪 50 年代中期开展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 既是为了满足少数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的政治需要, 也具有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和强调中国特性的双重追求。更重要的是, 从学术的内在脉络来看, 社会性质调查本身呼应了史学界关于“古史分期”讨论的需要, 其调查材料和结论在后续的论争中被广泛引用, 为史学研究开辟了新的理论和资料来源。其背后的原因是, 以泰勒和摩尔根为代表的“文化遗存法”这一古典人类学研究范式已经部分改变了中国历史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关于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的既有研究成果触及不多的重要理论课题。

〔关键词〕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古史分期; 古典人类学; 文化遗存法; 学科关系

〔中图分类号〕 C95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5-8575 (2013) 05-0023-09

20 世纪 50—60 年代开展的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曾经引起学术界的高度关注, 民族学界关于这一事件的回顾和评述不绝于史, 但这些讨论多局限于当时民族—国家建构的现实政治需要层面, 关于社会历史调查的学术脉络、学术互动、学术价值始终没有得到应有的关注和分析。^[1] 比如, 作为社会历史调查第一阶段社会性质调查与确认这一环节,^① 和调查前后历史学界关于古史分期的重大争论有着密切的关系。本文试图指出社会性质调查背后多重复杂的面向, 以期建立对这一调查更为全面准确的认识。

一、少数民族地区民主 改革的现实政治需要

1949 年新中国成立后, 中国共产党制定了一系列旨在让中国尽快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的改造方案。但是大规模的改造运动只率先在汉族地区推行, 在处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改造问题上, 中国共产党提出, 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改造切忌采取急躁冒进的方式, 只能在时机和条件成熟的情况下, 与少数民族群众充分协商后再推行。^[2] 1956 年春天, 汉族地区社会主义改造已经基本完成, 此时, 如何根据少数民族地区不同的社会状况进行改革, 从而引导少数民族同汉族一样实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 成为

〔收稿日期〕 2013-03-03

〔作者简介〕 伍婷婷 (1978—), 女, 云南昆明人, 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讲师, 博士。

〔基金项目〕 本论文为中国人民大学科学研究基金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 资助项目 “20 世纪 50—60 年代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的历史考察——以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调查判定为例” (项目编号: 10XNF015) 成果。

^① 根据王建民等人的研究总结, 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 1956 年 8 月到 1957 年止, 第二阶段从 1958 年 8 月到 1964 年结束。——参见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 《中国民族学史》(下卷), 第 6—7 章, 154—215 页。本文主要涉及第一阶段的工作。

中国共产党需要着手解决的当务之急。

1956年3月,毛泽东提出在全国范围内调查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状况,同时委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主持这项工作。8月,经过短期密集培训后,八个调查组奔赴不同的调查点开展工作,为期八年的全国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正式拉开了帷幕。

第一阶段工作的核心是调查少数民族社会性质。对新执政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社会性质调查有着重大的现实意义。在1956年3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和中央民族学院相关负责人会议上,彭真转达了毛泽东提出的要求“我国有些少数民族也准备进行民主改革了,需要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情况搞清楚,以便采取相应的对策。”^[3]正因如此,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从一开始就被认为不是单纯的学术工作,而带有强烈的现实色彩,具有为现实政治服务的一面。

但值得注意的是,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工作并非始于此次社会历史调查。新中国成立伊始,中央政府就已采取各种形式摸清民族地区状况,除派出工作组进入民族地区调查外,还邀请专家学者参与调查各民族的社会状况,这些调查中已经包含确认其社会性质的内容。1956年8月调查组的工作多属再调查、再确认。不仅如此,社会历史调查虽然被认为要为各地民主改革的政策制定提供指导依据,但事实上一些被调查民族的民主改革工作早已按照先期调查结论制订方案开始改革了,如云南省1955年2月已启动和平协商的土地改革,5月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实施了民主改革,紧接着改革推至西双版纳、思茅、临沧及怒江等民族地区。这些改革所依据的是1953-1955年社会性质调查成果。^[4]再如四川凉山彝族改革,1956年2月州人代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上已通过《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民主改革实施办法》,^①作为指导凉山改革的总体方案,明确提出“废除奴隶制度,解放奴隶,实行人民的人身自由和政治平等;废除奴隶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劳动人民的土地所有制,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为实现社会主义改造、开展合作化运动创造条件”,^[5]说明在9月调查

组到达凉山之前,该地区已经被初步认定为奴隶制社会,并按照这一性质着手进行民主改革了。以上事实说明,第一阶段调查并不只停留在为现实政治需要服务这一层面上,还应当具有其他意图或目的。

二、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与中国特性的双重追求

从表面上看来,所有调查都在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的框架及其政治经济学关于生产力、生产关系、土地所有制以及阶级关系等方面的理论知识指导下进行。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性质调查的目的之一是为了验证马克思主义普遍理论。

1956年3月31日举行的会议上,彭真转述的毛泽东讲话中谈到:

……现在我国少数民族处于各种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有原始社会形态、奴隶制形态、封建制形态,及这几种社会的过渡形态。现在世界上还不知道其他哪个国家,都保留这几种社会形态。我国少数民族地区这几种社会形态都还有,是一部活的社会发展史,是研究社会发展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活的宝贵的科学资料。少数民族地区在进行民主改革和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社会面貌将会迅速变化。因此,现在要赶快组织调查,要“抢救”,把少数民族地区这些社会历史状况如实记录下来,这些事情,早做比晚做好。早做能看到本来面目;晚做,有些东西就没有了,只能靠回忆了。……^{[3](P.430)}

这番谈话与中国共产党关注中国社会特殊性及其价值的思路一脉相承,即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内部,通过对不同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认识,不仅能够验证马克思对人类社会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科学论断,而且能为全面认识并补充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提供具有中国特色的生动案例。应该说,结合现实工作需要和理论研究层面,并以此认识和理解中国社会特性,是本次社会历史调查的基调。

^① 笔者注:此方案1956年3月获得中共中央批准。

社会性质调查如何能丰富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调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费孝通对此做了更细致的阐述。1956年7月召开的一次少数民族地区社会历史调查座谈会上，他说：

我们现在学习历史唯物主义的时候，关于社会发展史的部分，基本上是利用外国的教材，关于原始社会多根据摩尔根在北美调查的资料，关于奴隶社会不是举希腊、罗马的例子，就是罗列殷墟不完整的资料。……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不平衡，保留下来了許多不同发展阶段的现实材料。这些活的材料不仅可以使我们听起来更熟悉、更易接受，而且是更重要的。……我们知道，在相同的发展阶段上的各民族社会，它们的性质虽则基本上具有共同特点，但是它们具体的面貌却各有各的特点，……如果我们只从外国的教材中去学习社会发展的过程，固然可以了解一般的规律，但是对于我国各民族具体发展过程和它们的特点还是不容易理解的。因此我们还须对我国各民族社会发展的具体过程和特点，进行研究，这项研究的结果，可以大大丰富我们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知识。

我国各少数民族都向社会主义过渡，但是由于它们原来的社会性质不同，所以过渡的方式不一样，它们当前发生的问题也不同。……

再说，在我国各民族历史上，由于和汉族封建社会相接触，曾经发生过跨越若干阶段的发展过程。……足以提示我们应当进一步去研究汉族封建社会对各民族发展上的影响，这项研究无疑地可以丰富我们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理论。^[6]

可以看出，费孝通认为，通过社会性质调查工作搜集到的民族学资料，将使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的认识不再囿于西方社会的材料或是古史

的材料，而能够从中国社会内部的丰富性出发补正并更加全面地理解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如此，学界借此可以获得对中国社会本身更加细致和深入的理解。这项工作除了对认识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有所裨益外，其更重要的价值还在于，这条结合社会发展一般规律并植根于中国社会特殊性的认识道路，能够为建设新中国提供不可或缺的参考。

综上，仅从初衷来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是有多重追求的：首先是验证、并且以中国的民族学材料来丰富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史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普遍论述；其次是在这个基础之上，突出中国社会历史发展历程的独特性；最后，在进入社会主义阶段之前，抢救并保存不同历史阶段的真实状况。

三、社会性质调查与古史分期讨论

基于现实政治需要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树这两大理由而进行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最终结出了丰厚的学术果实。社会性质调查针对的是全国范围内处于不同社会形态的少数民族社会的全貌，在不同程度上对婚姻家庭、风俗习惯，包括宗教文化均有涉及。^①调查形成的上千万字的资料成为后来学界研究少数民族社会珍贵的第一手素材。不仅如此，这批材料的价值也并未局限在民族研究领域，作为整项调查工作负责人之一的谢扶民在工作报告中说：

我们所调查的材料已引起社会科学界广泛的注意。过去我们所付印的各民族的调查材料，每种材料都印了五六百份，发给一百多个有关单位，无论历史学界、哲学界、教育部门、民族工作部门，都对我们的调查材料感到极大的兴趣。某些科学研究部门把我们调查的材料作为研究中国古代史、东方民族发展史的重要参考资料。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从我们的调查材料中，可以研究人类社会发展史的一般规律，同时也可以研究各民族发展的特点，可以研究一般规律中的某些特殊问题。^[7]

^① 见1956年4月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制定的《关于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各民族社会历史情况的调查研究工作的初步规划》所规定的调查方针。然而，在调查的第二阶段，社会性质之外的调查就因1957年反右运动的开始而终止，并成为调查组以及一部分调查成员受到右倾批判的导火线。

这段话触及本文探讨的核心论题，那就是社会性质调查必须放置在当时大的学术背景之下，考察与其他领域学术活动的互动关系，才能对这一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产生客观全面的认识。其中，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与历史学界的互动尤为突出，不仅为论证社会发展一般规律提供佐证，也为理解中国社会的丰富性和特殊性提供了答案。

（一）中国古史分期争论

作为当时史学界热议的“五朵金花”之一，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古史分期讨论始于1950年3月郭宝钧和郭沫若之间关于殷、周是否是奴隶社会的学术论辩，随后史学界就一系列相关问题掀起了热烈讨论。论争的意义绝非仅为还原历史阶段的本来面貌，而是从历史学的角度，通过中国的案例证明五种社会形态发展规律的普适性，以此论证中国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并为当时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合法性。

不仅如此，该讨论也触及如何理解中国历史和社会特性的问题。讨论主要围绕奴隶社会、封建社会两大社会形态在中国历史上的产生、发展以及特征等展开，其中有关奴隶社会的问题在学界引起了广泛争论。该议题涉及中国社会有无奴隶社会，奴隶社会的特征、形成条件、结束时代，奴隶制被封建制取代的标志、演变的途径等一系列问题。大多数学者认同奴隶社会是人类社会普遍经历过的历史阶段这一说法，认为中国历史上封建社会不可能由原始社会直接转化而成，其间必定经历了奴隶社会的演化。也有少部分学者，比如童书业、雷海宗、李鸿哲等持相反看法。后者虽然在当时受到批判，但也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学者在阐释马克思经典理论普遍性的同时亦关注到了中国历史与社会的特殊性。不仅如此，学者们很快发现上古文献所反映出的中国社会情况与古希腊、罗马的经典奴隶社会有着很大区别，比如血缘关系纽带紧密、缺乏土地私有制和大规模奴隶等等。赞同奴隶社会的学者们也开始讨论中国历史上的奴隶社会是否具有独特性的问题，部分人受到苏联史学界“东方奴隶制”概念的影响，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不同于欧洲模式，具有自身的特殊性，属于古代东方奴隶制社

会。尽管这样的提法仍带有明显的教条色彩，但亦不失为一种认识中国社会特殊性的有益尝试。

（二）人类学研究对历史学理论与方法的冲击

对于上述问题，史学界常用的研究手法多从古代文献出发，或用文献辅之以地下出土的考古材料和甲骨文研究成果来证明自己的观点。但即便如此，已经有学者提出讨论上古社会分期的材料运用应该更为不拘一格，以便更有效地厘清观点上的分歧。杨向奎专门谈到扩大文献史料的使用范围“对于文献上的史料，也有待我们的重新整理与估价。我们书上的材料很多，但许多有用的材料，因为前人给它的评价过低，还少有人使用来讲中国古代史。”随后他一一列举了《左传》、《周官》、今文经尚书中的《虞》、《夏》、《尚书》、《大小戴礼记》、《逸周书》等史料，包括后人的经解著述如孙贻让的《周礼正义》的价值来说明，“古书上的材料不敢用，考古发掘还正在展开，我们的古史研究，只是局限在有限的材料上，翻来覆去，因为各人的理解不一，结论就彼此分歧。如果不丰富我们的史料来源，就原有材料，很难得出大家一致的结论了。……我们希望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者，从中国历史实际出发，运用历史唯物论的方法结合着丰富的史料深入一步，弄清古代历史上的关键问题，才能解决古代社会性质问题及划分阶段问题”。^[8]

杨向奎提出的问题一方面表明了古史分期研究中的一个困境，另一方面也指出了扩大证据来源与深化研究的关系，强调丰富材料来源的重要性和可能性。尽管杨向奎对后一点的强调仍然是从历史学内部寻找解决途径，然而当时对此问题的解决其实已经超出了历史学本身，在更大的学术场域中，这正是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所提供的贡献，可以说，它为研究古史分期问题提供了另一条论证思路。

那么，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材料如何能为研究中国古代史，尤其是研究古史分期提供参考依据呢？这里关系到建国后学习历史唯物主义过程中因认识论的转变而引发的一次研究方法更新。具体而言是进化史观如何处理古与今、时间与空间这两对关系，其认识论来源于19世纪西方社会流行的社会进化论，而方法论则脱胎于同

一时代产生的新兴学科——人类学/民族学^①的“文化遗存法”。

社会进化论实则将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规范在一个从低到高、从简单到复杂的直线性发展的序列中。整个序列中，非西方社会被看做是社会进化的低级阶段，而现代西方文明社会则被看做是社会进化的最高阶段。这种以西方社会为中心看待全球人类社会发展史的认识观，容易让人们产生这样的理解：古与今之间是野蛮与文明在时间上的差别，同时非西方与西方社会之间则是野蛮与文明在空间上的差别。

同一个时代里，社会进化论催生了人类学的第一个理论流派——古典进化论学派的诞生。有别于其他学科，人类学的特殊性在于研究对象是西方社会之外的，被认为是原始落后象征的部落社会及其文化。在研究这些现存的“野蛮”社会的过程中，古典进化论学派的学者创造出一套使这些社会能够被理解和研究的方法，英国人类学者爱德华·泰勒(E. B. Tylor)的“文化遗存法”(cultural Survivals)是其中的突出代表。其方法论的来源基于社会进化论的框架，认为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一些特征仍然会存留至较晚的或当前的阶段，这些遗存物在现实社会阶段缺乏当前的社会根基，已丧失了其原有的意义，但它们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活的见证，通过观察、研究这些遗存物有助于探求人类文明的早期形态及其发展历程。

这一方法的诞生意味着，学者们相信，可以通过考察当代“野蛮”社会的诸特征来复原无文字记载的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历史面貌。和泰勒同一时代的美国人类学者路易·摩尔根(L. H. Morgan)借助北美印第安易洛魁部落的翔实材料，所撰写的《古代社会》一书中也是运用这种遗存法则进行的研究。正如他开篇引用的一段话所表明的“这些(古代)社会反映了我们数千代以前的祖先的精神面貌。我们在肉体上和心灵上已经度过了与此相同的一些发展阶段，而我们之所以成为我们今天这个样子，正是由于曾经有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劳动和他们的奋斗。”^[9]显然，这里摩尔根将印第安人当作理解

人类早期历史的活材料来加以研究，他通过印第安人的社会政治组织的材料，不仅勾勒了整个人类社会政治组织的发展进程，而且用这些材料论证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社会如何从部落社会向具有近代西方政治组织雏形的政治社会演变的过程。恩格斯对此的评价是“摩尔根底(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并且在主要的特征上恢复了我们的成文历史底(的)这种史前的基础，并且在北美印第安人底(的)血统联系中找到了一把钥匙，用这把钥匙解开了古代希腊、罗马及德意志历史上至今尚未解决的最重要的谜。”^[10]

摩尔根这本巨著被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重视，恩格斯在该书的基础上运用唯物史观写成《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并与《古代社会》一道成为中国人学习历史唯物主义最基本的读物之一。随着历史唯物主义在新中国知识界的普及，进化论对社会历史的解释框架，包括摩尔根用“文化遗存法”研究原始社会的解释逻辑都被学者们所熟悉。具体而言，就是把生活在中国社会内部的广大少数民族当作揭示原始社会史、社会发展早期阶段在现代社会的“遗留”加以研究。正因如此，我们经常看到诸如“活化石”、“活材料”、“活的社会发展史”、“活生生的材料”、“活的科学资料”等语汇在此时期有关少数民族的调查及研究材料中被频繁使用。

(三) 少数民族调查材料在古史研究中的应用

虽然将少数民族的资料当作“活材料”在学界广为使用是20世纪中期后的事情，但是运用这些“活材料”解决中国古史上的疑难问题在之前已被一些熟悉人类学理论知识的学者所实践。如徐中舒在研究周代井田制的问题上，除广泛征引古史和古文字材料外，他还使用一些近代以来边疆少数民族的材料来证明自己的观点。^[11]文后的“跋尾”里他交代了材料使用的原委：“井田制有无，遂成学术上一大问题。^②……余今为此文，所据材料，并不能超过彼时所有。唯我国文字中所蕴藏之丰富史料，则往昔尚未能充

^① 这里的“人类学/民族学”特指社会文化人类学，其在欧陆传统包括苏联学界则被称为民族学。1949-1979年期间，作为一门学科，英美传统的社会文化人类学在中国内地被取消，但是其部分特征留存在受苏联影响而被保留下来的民族学中。二者之间的区分和关系非本文内容，暂不赘述。在下文的叙述中只用“人类学”之名以便简化。

^② 笔者注：指胡适挑战井田制真实性一事。

分利用。而我国边裔部族，至今尚多滞于封建社会中者，仍存计口授田之实。数年前冯汉骥先生告我，滇边之车里及美洲英卡（Inca）帝国之田制，颇与井田相似。在我国边裔及初民社会中，既有此制，则《孟子》、《周官》所称之井田，必非向壁之谈。”^[11]

与徐中舒使用少数民族材料解决古史研究中的某个具体问题不同，另一些受到唯物史观影响的学者，其代表人物如郭沫若，则已开始用类似材料来探讨社会发展史的问题了。郭沫若除了运用所擅长的历史文献、甲骨文、《诗经》等材料外，还重视用凉山彝族社会的调查材料作为其证明殷、周为奴隶社会的有力佐证。在他看来“这些兄弟民族的情况正不失为解决中国古代社会的关键。了解得这些情形，回头再去读殷、周时代的典籍，有好些暧昧的地方也就可以迎刃而解了”。^[12]

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继续在古史研究中提倡采用上述研究方法。1953年10月20日，他在《奴隶制时代》“改版书后”中写道：

要阐明我国的古代社会自当尽力找寻和占有直接的史料。但因时代远隔，直接的史料很有限，因而必须采取权宜的办法——用间接的资料来作比较研究。古代的希腊、罗马固然可资比较，而尤其重要的是我们国内的兄弟民族的情况能够为我们提供很丰富的资料。

我曾注意到彝族社会的情况，在《青铜时代》和《十批判书》中都曾提到过，在本书中也曾提到，但我所依据的资料是已经陈旧了。很庆幸的，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对于彝族社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这里我把胡庆均同志在凉山彝族的调查^①扼要叙述一些，补正我书中的不足和不明确的地方，以供读者参考。（原注3：一九五六年至一九六二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四川省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和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四川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

组，先后对民主改革前的凉山彝族社会历史进行了比较全面的和系统的调查，获得了关于民主改革前凉山彝族社会形态的大量真实材料，写出了多种调查报告，可供参考。^②）^[13]

20世纪50年代之后，史学界的其他学者，其中既有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又有从事古史研究的，也都开始尝试运用相继公布的各少数民族社会性质的调查材料来讨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比如，邓子琴的《从少数民族社会的考察和研究来看西周社会性质问题》一文用凉山彝族和羌族的材料区别了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阶段的不同，继而说明西周社会属于封建领主制社会；^[14]马曜、缪鸾和也利用亲自前往西双版纳地区实地调查所获傣族社会资料，与西周的土制度进行对比研究，提出西双版纳傣族的社会性质无论是土地所有制的形式、剥削方式还是农村基层组织、阶级结构等方面，既不同于秦汉以后中原地区的封建地主经济形态，又不同于欧洲的农奴制度，而是类似于西周至春秋时期建立在农村公社基础之上的封建领主制，从而再次论证了西周的社会性质非奴隶社会，实为封建社会的早期形态。^[15]此外，杨宽和束世澂之间的论争也是此类讨论之一。

杨宽在1960年8月9日的《文汇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③的文章称，近年来对兄弟民族的社会历史所作的调查将大有助于对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和解决。^[16]文中他举出凉山彝族奴隶社会中，占奴隶人数7%和30%的呷西和瓦加均属于生产奴隶的例子，来论证西周社会不是只存在家内奴隶的“古代东方型”奴隶制社会。此外，他继续利用凉山的家支制度维护本家支成员的等级利益、帮助本家支统治奴隶的例子说明，家支制度的性质与古代宗法制度相同，虽然都是奴隶主维持专政统治的工具，而且所谓宗族长固然对宗族成员有管理权，但同样也有保护其利益的义务。借此杨宽指出，在“古代东方型”奴隶社会中，以宗族成员为族长奴隶这一论断是错误的。结合凉山彝族奴隶社会的实例恰恰说

① 笔者注：此处所指胡庆均的调查报告是其1950年参加中央访问团访问凉山后所撰的《大凉山彝族社会概况》。

② 笔者注：该文写于1953年，原注3的内容应该是1973年人民出版社出版改编本时新补注的内容。

③ 笔者注：该文随后收入其1965年中华书局版的《古史新探》论文集，其中多有补充和修订。本文所用材料来自该论文集。

明,西周社会并非典型的“古代东方型”奴隶社会,而是一种特殊的奴隶社会形态。^[16]

同年,束世澂发表文章《有关古史分期一些理论问题——与杨宽同志商榷》,针对杨宽提出的论题进行论辩。束世澂着重回答了如何运用兄弟民族历史发展的事例来开展研究的问题。他首先不赞同杨宽用凉山彝族的社会材料来论证西周社会性质的做法,认为其中有对凉山材料的误读;^①其次他提出了使用少数民族社会历史材料研究古史分期的限度问题。一方面他认为“少数民族的历史发展可以提供研究社会发展史的参考,但绝不能作为根据,用来‘解决’中国古史分期问题”。^[17]因为中国少数民族社会和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复杂性是像北美印第安人这样的民族所没有经历过的,使用这些材料的时候应当充分考虑到这一点。但即便如此他也认同,利用少数民族社会发展的研究能够充分证明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比如民主改革前的西藏社会、傣族社会、布依族社会,作为领主农奴制封建社会,的确可以用来证明初期封建制是领主农奴制这一普遍规律的。^[17]

束世澂在利用少数民族材料来补正古史分期研究上采取比较谨慎的态度,但这也并未妨碍他承认这些材料对研究古史分期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正因如此,在对西藏社会性质的研究中,他认为西藏社会不是奴隶社会而属于封建社会的早期形态——封建土地所有制时期,此结论可从西藏金字塔形的领主土地所有权形态以及由领主和农奴构成的阶级结构得到证明。与此同时,他也认为这一论断可以印证马克思社会发展史经典理论认为封建社会分为领主所有制和地主所有制两个阶段的正确性,具体到中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则表明秦汉直至土改之前均属于封建社会的后期阶段,而前一阶段的实况完全可以从西藏社会的情形中窥得一二。^[18]因此他最后说“我们离开领主农奴制时代已经很久远,已不能理解农奴制的残酷;看到欧洲农奴社会中领主的罪恶行为,也感到不可思议,还认为中国不会有这种情况。西藏农奴社会种种暗无天日的状况,却给我们学历史的人获得一份惨痛的补充材料!当然,也可作

为研究古史分期问题的参考。”^[18]

上述事例说明,1956年展开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取得的成果,在更大的学术对话空间中,为厘清当时史学界争论的热点问题提供了一份全新的证明材料,结合并运用这些材料,被认为对更准确地把握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特征及其总体发展规律创造了新的可能。

四、小结与讨论

1956年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活动的展开,尤其是前期的社会性质调查的确与当时民族工作的迫切需要有着密切关系,具体而言即是通过调查摸清各少数民族的社会性质,为各少数民族的民主改革工作寻找恰当的改革策略,从而为少数民族地区完成社会主义过渡奠定良好的基础。同时,这项工作肩负着另一项任务,那就是对解放初期首次社会性质调查的结论进行确认和补充,本次调查组的工作侧重于尽可能充实某社会性质的社会材料,为理解该性质的社会提供更翔实的参考依据。

虽然社会性质调查首先源于当时政治生活的需要,但是正如我们看到的,它与当时的学术生活同样有着密切的互动。具体而言,社会性质调查材料为同一时期学术界热烈讨论的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提供了历史学与考古学之外的第三种证明材料——人类学的材料。在这个过程中,学者们借用这些“看得见”的材料,反观中国历史早期阶段以辨别这些阶段存在的真实性及其诸特征,从而不仅论证了马克思社会发展理论的普遍适用性,也试图通过这些材料强调中国社会发历史展的特殊性。

运用人类学材料证明古史问题,从认识论的角度来说,受到当时流行的社会进化论的影响;在方法上,则是借鉴了人类学古典进化论学派的所谓“文化遗存法”。这一方法在社会进化论单线进化的模式下,按西方现代社会的发展标准,将处于同一空间的不同社会理解为时间上的不同发展阶段,人为将它们划分为野蛮与文明之别。人们相信通过观察现存的“野蛮社会”——也

^① 束世澂本人曾亲自参与四川社会历史调查组调查凉山社会性质的工作,同时也参与了当时凉山社会性质的大讨论。他不赞同将凉山社会判定为奴隶制社会,认为凉山属于封建领主制社会。正因如此,杨宽的立论前提——凉山是奴隶制社会已被他否定。束世澂阐明凉山社会性质的文章,参见其《论凉山彝族解放前的社会性质》(原载《新建设》,1961年第6期),后收入《凉山彝族奴隶制》编写组编《凉山彝族社会性质讨论集》(内部参考),271页,1977年成都。

即人类社会的“活化石”——可以复原人类社会早期阶段的真实状况。在这一方法的指导下,中国境内少数民族社会性质调查也被赋予了相同的意义。人类学和历史学界利用社会性质调查资料,共同勾勒出一部完整的五阶段式的中国社会发展史。

人类学理论方法对中国历史学界的影响是循着两个途径发生的:其一是直接的,如徐中舒,受到人类学家/民族学家冯汉骥等人的潜移默化

影响;另一种则是间接的,摩尔根的早期论著影响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史观,随着历史唯物主义成为新中国的知识正统,社会进化论与历史阶段论解释模式成为唯一的理论资源。换言之,由于被视为资产阶级学科,新中国成立后很长一段时期内,人类学学科在中国内地学术界销声匿迹,但它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政治和学术进程,这一点是此前的学术界所习焉不察的。

(参考文献)

- (1) 王建民,张海洋,胡鸿保.中国民族学史(下卷)[M].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8:154—162,203—215;顾定国(胡鸿保,周燕译).中国人类学逸史——从马林诺斯基到莫斯科到毛泽东[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189—193;范可.他者的再现与国家政治[J].开放时代,2008,(6):97—108;定宜庄,胡鸿保.寻找满族——思考“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及其影响[J].清华大学学报(哲社版),2009,(2):39—47.
- (2) 国家民委政策研究室.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论民族问题[M].北京:民族出版社,1994:44—46;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5册)[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655—658;中央文献研究室等.邓小平西南工作文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等,2006:197.
- (3) 刘格平文集[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430.
- (4) 马曜.云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回顾[A].宝林、华祖根.中国民族研究年鉴(1999年卷)[C].北京:民族出版社,2000:59—74.
- (5) 秦和平.四川民族地区民主改革研究——20世纪50年代四川藏区彝区的社会变革[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11:64.
- (6) 费孝通.开展少数民族地区调查研究工作.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新编(上卷)[M].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226—228.
- (7) 谢扶民.两年来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的基本总结.民族工作的跃进[M].北京:科学出版社,1958:11.
- (8) 杨向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商榷[J].文史哲,1955(1):51—52.
- (9) 路易斯·摩尔根(杨东莼,马雍,马巨译).古代社会(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4.
- (10) 恩格斯(张仲实译).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八八四年第一版序言[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6.
- (11) 徐中舒.井田制探原[A].川大史学·徐中舒卷[M].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06:304(原载于《中国文化研究汇刊》第4卷上册,1944年9月).
- (12) 郭沫若.由周代农事试论到周代社会.青铜时代.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外二种(上)[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414.
- (13) 郭沫若.奴隶制时代[A].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247—248.
- (14) 邓子琴.从少数民族社会的考察和研究来看西周社会性质问题[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1960(2):91—101.
- (15) 马曜,缪鸾和.从西双版纳看西周[J].学术研究,1963(1,3,5).
- (16) 杨宽.论中国古史分期问题讨论中的三种不同主张[A].古史新探[M].北京:中华书局,1965:51.
- (17) 束世激.有关古史分期一些理论问题——与杨宽同志商榷[J].学术月刊,1960(9):31.
- (18) 束世激.西藏社会性质的分析——古史分期问题研究的一个参考[J].学术月刊,1959(6):48—50.

The Interaction between Investig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Social Nature and Historical Dispute in the 1950s

WU Ting-ting

(History Department,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Through reviewing literature and historical studies after the founding of the New China, we can find that in the 1950s, investigations of ethnic minority social nature were carried out to meet the political needs of democratic reform in ethnic regions, to enrich social theory of Marxism as well as to emphasize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More importantly, in academic perspective, social nature investigations responded to the discussion of staging ancient history in the field of historical studies, and the data and conclusions were widely quoted in subsequent arguments, which provided new material sources for establishing new theories. The reas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the Cultural Heritage Law of Tyler and Morgan, a classical anthropological paradigm, has caused changes in theory and methodology of Chinese historical studies. This is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project in the field of ethnic minority social nature investigation which has not been studied sufficiently.

[**Key words**] investigation of ethnic minority history; staging ancient history; classic anthropology; cultural heritage law; discipline relation

(责任编辑 李 劼)